

## 前言

道德標準是個人行為的準則，它能让個人的行為有所規範。而當個人行為脫離道德標準時，為了避免接踵而來的自我譴責，預期性的自我制裁與內在道德標準將會同時產生，以激勵與監督個人的行為，使之導向正軌（Bandura, 1990; Bandura, Barbaranelli, Caprara, & Pastorelli, 1996a）。然而，一旦個人行為與內在道德標準發生嚴重衝突，而個人無法以正面理性的方式解決時，道德疏離（moral disengagement）機制便因此啟動。所謂道德疏離係指個體透過道德或價值觀的再認知過程，合理化和辯護自己非道德的行為，使個體不會因為做了不道德的事情而產生愧疚與自責（Lazarus, Barkoukis, Ourda, & Tsozbatzoudis, 2013）。因此，道德疏離機制的啟動，可以促使個人在從事非道德行為時，避免產生自我譴責，同時又保留原有的內在道德標準（Paciello, Fida, Cerniglia, Tramontano, & Cole, 2013）。

道德疏離的去抑制化力量（disinhibitory power），會降低個體自我節制的力量，進而引發各種不良的偏差行為（劉仲矩、黃金榜，2008；Paciello et al., 2013），因此，即使是平日行為符合規範的人，亦可能透過道德疏離機制的運作，施展攻擊他人的恐怖行動（Almeida, Correia, & Marinho, 2010）。Perren 和 Gutzwiller-Helfenfinger（2013）以及Pornari和Wood（2010）等人的研究發現，青少年的道德疏離不僅與傳統霸凌行為有正相關，亦與網路霸凌行為有正向關聯。Paciello、Fida、Tramontano、Lupinetti 和 Caprara（2008）彙整多篇相關研究，亦發現青少年的道德疏離傾向與侵略、暴力及霸凌行為有強烈的關聯性，道德疏離能預測暴力、竊盜和其他反社會行為；此外，高道德疏離者較容易出現急躁、報復性思想，以及身體和言語攻擊，且高道德疏離者不僅對於傷害行為有較少的愧疚感，也較不容易表現出親社會行為。

青少年霸凌議題蔓延全球，霸凌事件亦對青少年的身心靈產生負面影響（*Accordino & Accordino, 2011; Olweus, 2012*）。校園裡若不能營造一個友善空間，青少年學生的成長與學習都將蒙上陰影。根據上述學者的研究可知，青少年的道德疏離與霸凌等反社會行為有所關聯，甚至能預測反社會行為的發生。因此，若能藉由一份有效的研究工具以探索青少年道德疏離的現況，或許能有助於後續進一步探討學生的各種反社會行為，進而有效防堵霸凌事件的發生。

*Bandura*等人（1996a）即藉由自身所主張的道德疏離理論，編製出一份「道德疏離機制量表」（*Mechanism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Scale*）。由於*Bandura*等人的道德疏離機制量表具有完整的理論依據，不少國外學者亦多以此理論為基礎，進行相關量表的發展或研究的探討（如*Almeida et al., 2010; Boardley & Kavussanu, 2007, 2008; Caprara, Fida, Vecchione, Tramontano, & Barbaranelli, 2009; Hymel, Rocke-Henderson, & Bonanno, 2005; Obermann, 2011a, 2011b*）。

反觀國內，以道德疏離為主題之研究則相當稀少，如在結合CEPS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與CETD中文碩博士論文資料庫的「華藝線上圖書館」，以*moral disengagement*、道德疏離、道德脫離、道德解離為關鍵字進行搜尋，僅獲得六篇相關研究，且偏重探究道德疏離在軍事與政治（詳見余一鳴，2012a，2012b；余一鳴、顏志龍，2011）及運動情境上的相關應用（周宏室、徐偉庭、陳文長，2011；蔡俊傑、管世弘，2010；蔡俊傑、羅鴻仁、管世弘，2012）。據此，儘管國外已有許多研究發現青少年的道德疏離與霸凌行為有正向相關，但國內對於道德疏離的探究鮮少，更遑論青少年道德疏離測量工具的發展。由於*Bandura*等人（1996a）的道德疏離理論與量表為許多國外學者在進行道德相關研究時的基礎，因此本研究旨在編譯其所編製的「道德疏離機制量表」，探究該量表是否適用於測量臺灣青少年的道德疏離，並期望本研究能發揮拋磚引玉之效果，喚起研究者對於青少